

张海鹏先生

七秩初度纪念文集

**Commemorative Edition for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Prof. Zhang Haipeng's Birth**

金东吉◎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金东吉◎主编

张海鹏先生

七秩初度纪念文集

Commemorative Edition for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Prof. Zhang Haipeng's Birth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海鹏先生七秩初度纪念文集/金东吉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 - 7 - 5097 - 0152 - 2

I. 张... II. 金... III. 张海鹏 - 纪念文集 IV. K825. 8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4506 号

张海鹏先生七秩初度纪念文集

主 编 / 金东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编辑中心 (010) 65232637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魏小微 范 迎

责任校对 / 贾凤彩 吕继中

责任印制 / 盖永东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35

字 数 / 606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152 - 2/K · 0012

定 价 / 8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金冲及*

我和张海鹏同志相交40年，近二十多年交往尤密。他的学生发起要为他70寿辰出一本纪念文集，嘱我为文集写篇序，我是应该写的。

海鹏同志一直是一位“双肩挑”的学者。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内，他既长期担负着繁重的学术组织工作，又坚持着从事研究工作。两者得兼而不偏废，实在是很难不容易的事情。

他是1964年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的。不久，就遇到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以后，从1988年起，当了6年副所长，又当了10来年所长。近代史研究所是我国近代史研究的重镇，工作涉及国内国外方方面面，作为这样一个所的主持人，其忙碌可想而知。我1985~2000年有15年兼任过近代史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委员，许多事都是亲历或亲见的，因而有格外深切的感受。

记得四五年前，有一次我同他开会住在一起，晚上聊天直到深夜。他讲到这么多年在近代史所里担任所长经历的甘苦。别的没有多讲，着重说到使他宽慰的，就是近代史所在这些年里将“断层”的问题解决了。他一说，我就明白。本来大家为近代史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前几年，近代史所进了一批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的大学毕业生，这些人后来都已成为所里研究工作的骨干，但“文化大革命”的整整10年中，所里再没有补充进人，一旦刚才所说那批研究者退休的时候，中间确实存在着出现“断层”的危险，但经过

* 金冲及，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原会长。

后来的十几年，新的研究力量已经很快成长起来，后继有人，他们中有些是从所里年轻的研究工作者中培养出来的，有些是尽力从其他地方引进的。现在，近代史所依然能当之无愧地称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重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工作中，海鹏同志应该说功不可没。他的学生们积极地为她出这本纪念文集，我想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点也应该讲到：在他主持工作的这段时间内，近代史所的对外学术交流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同台湾地区和日本、美国、俄罗斯、法国等国的学者建立起密切的交流和合作。这里，包括组织多种国际学术讨论会，邀请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学者来所讲学或做学术研究，安排本所学者外出访问等。这些当然是大环境决定的，但海鹏同志确实也尽了力。

尽管作为所长的工作这样忙，但他仍一直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从不间断。他的研究工作有两个特点：一是视野比较宽阔，观点鲜明，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的一些宏观问题多所思考，例如他对中国近代史中的“沉沦”和“上升”问题的探讨，就很受史学界同仁的关注。二是他又有比较扎实的治史功力，能对一些比较重要的微观问题进行细腻的剖析，如他写的《湘军在安庆战役中取胜原因探析》、《宝善里炸药爆发时间考实》、《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考异》等，体现了近代史所历来提倡的严谨平实的学风。

近年来，海鹏同志的研究领域又扩展到台湾历史研究方面。更值得说的是，去年由他主编的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出版，这是一部皇皇巨著，受到学界的好评。

如今，海鹏同志摆脱了大量繁重的日常行政工作，尽管各方面的社会活动还不少，但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终究可以多一些。人生 70 以往叫做“古来稀”，如今已不算什么，也许还可以成为一个新的起点。我相信，海鹏同志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一定可以作出新的更多的成绩。

金冲及

2008 年 2 月 25 日

目 录

- 序 金冲及 / 1
- 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与转折 张海鹏 / 1
- 《中国近代通史》笔谈 茅家琦 龚书铎 张昭军 李文海
熊月之 罗志田 马 敏 桑 兵 郭世佑 / 31
- 关于太平天国宗教研究的几点思考 路 遥 / 62
- 台海两岸学术交流中的一叶 张玉法 / 68
- 传统与现代信仰 [波兰] 施乐文 / 71
- 愿与海鹏兄并肩共进 胡春惠 / 80
- 蔡锷的生平和业绩 曾业英 / 83
- 班乐卫 1920 年中国之行 [法] 巴斯蒂 / 101
- 孙中山与日本 林启彦 / 121
- 在殖民与脱殖民之际：高柄翊与二战后韩国
“东洋史学”的重构 [韩] 白永瑞 / 133
- 海鹏同志与我的“第三种力量”研究 闻黎明 / 148
- 抗日战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荣维木 / 158
- 论宋元时期的历史与文化 王育济 / 168
- 张海鹏先生寿诞祝贺 茅海建 / 208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民国史研究概况	汪朝光 / 211
“痘禀胎毒”：一项基于宗教学视角的观念史考察	姜 生 / 219
意识形态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 ——以艾奇逊和承认问题为中心的再研究	王立新 / 236
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 ——张海鹏先生的学问人生	李细珠 / 258
北洋集团与清末东三省新政	马平安 / 278
台湾总督府移民政策 ——以官营农业移民为核心	王 键 / 294
清末台湾的防军	许毓良 / 321
张之洞“从缓”“从速”立宪论	邓红洲 / 342
论储安平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之思想转变	赵一顺 / 363
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思想	龚 云 / 379
苏日中立条约的缔结与影响	[韩] 金东吉 / 392
赫德与中英商约谈判	张志勇 / 406
李仙得与日本第一次侵台	李 理 / 417
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二·二八”事件研究评介	杜继东 / 442
光复初期台湾农会与合作社分合问题	程朝云 / 467
论济南惨案中的国际宣传	赵庆云 / 483
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对“五五宪草”的两次修改 ——以中间势力的黄炎培为例	王凤青 / 493
1950~1952年国民党在台改造初探	冯 琳 / 505
附录 张海鹏七十初度自订年谱简编	/ 529
后 记	/ 552

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与转折

张海鹏

一 中国近代史的时限及其分期

中国历史学者今天所说的中国近代史，指的是1840~1949年之间的中国历史。这109年的历史，是有史以来中国社会变化最剧烈的时期，是中国落后挨打并逐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是中国人民在民族危亡面前不断觉醒，为了国家独立、民主和社会现代化而奋起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统治者的时期，是中国社会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是旧中国走向新中国的关键时期。

中国近代史包括了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一个是1840~1911年12月的晚清历史，另一个是1912~1949年的中华民国历史。

历史分期问题，在我看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以往的历史学者，往往把历史写成了帝王将相、英雄人物的家谱。他们往往以王朝更迭作为历史叙述的先后次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往往认为中国历史可以依据其不同时期的发展的特点，比如按照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或者按照历史上阶级斗争的不同表现，或者按照人民群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作用，将历史发展划分为若干个段落，以此来观察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以此来阐释历史发展的方向。最早主张遵循唯物史观指导中国近代史撰写的历史学者李鼎声在《中国近代史·序论》中，认为历史学不再单纯是一种记载的科学，“它不仅要记述人类在与自然斗争及创造自己的历史过程中的种种活动，而且要说明此活动历史的条件与原因，解释历史上各种重大事变的因果关系

以及指出在何种情况之下一旧的社会为新的社会所代替”；历史学任务的改变，决定了传统的“以帝王、圣贤、英雄为中心，专门记载朝代兴亡治乱的历史体系和那种偏重于人类文化生活的记载，而不能说明文化兴衰递嬗的全过程的历史编制，不能合理的存在了”；“中国历史是全人类历史的一部分”，研究中国历史的主要任务，“乃是要考察中国社会在全人类历史之一般的进程中，特有的发展路线，同时要解释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变，如民族的分合斗争、社会形态的转变、交替，各阶级的分化战斗，各种文化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递嬗变化等等发生的原因与其成果，说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汇影响。只有这样，中国史才能成为人类一般历史的一个支流，才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国民族的内在变化与外在关系，而变成我们一种有用的智识的工具”^①。

从这里出发，就产生了中国近代史的时限及其分期问题。

近代史一词，来自于欧洲的 Modern History。欧洲学者所谓 Modern History，大体上是指公元 1500 年以来的历史，这种认识是从欧洲历史发展道路出发的，它实际上包括了今天我们所说的近代史、现代史甚至当代史。日本用汉字近代史翻译 Modern History，含义与西文相同。中国自古就有近代、近世的说法，其含义比较含混，似乎没有确定的时间概念。

中国近代史这门学科在 20 世纪初开始萌芽、发展。20 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学者所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书，对中国近代史的时限范围没有明确的概念。那时候的近代史书，往往命名为：中国近世史、中国最近世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近百年史，没有统一的称呼。这些著作的时限范围，也很不一致。大多是从清朝道光年间写起，也有一些从明末清初写起；中国近代史终止于何时，也没有明确的说法，大多写到著作完成的前几年。

1933 年李鼎声出版《中国近代史》以后，1935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陈恭录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两卷本），1938 年在长沙艺文社发表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1941 年郭廷以在重庆出版《近代中国史》，1947 年华北新华书店出版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华岗在 1949 年出版《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作为一本书名，或者作为一个学科的名称，大体上确定了下来。

第一次提出中国近代史的时限范围，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范文澜在华北解放区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第一次给出了中国近代史的时

^① 李鼎声：《中国近代史》，上海，光明书局，1933，第 1~2 页。

限范围。范文澜的著作把上编的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定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下编的五四运动以后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就是说中国近代史包括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这样的时限范围和分期，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为全国初级中学编写的《中国近代史》教材，1949年4月在北平出版。这本教材的编辑说明指出：“本书为初级中学中国近代史课本。全书分二编：上编叙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1840~1919）；下编叙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1919~1945）。”^①这本课本是一个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它不仅为新中国建立之初迫切需要的初中历史教材解了燃眉之急，而且是对1949年以前中国近代史书编纂体系的一个良好的总结，也为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指出了基本的方向。

作为学科名称，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在1949年以前的作者，没有明确的区分。典型的例子是李鼎声的书，1933年在上海出版的名为《中国近代史》，1940年在香港出版的名为《中国现代史初编》；曹伯韩的书，1939年出版的名为《中国现代史常识》，1946年出版的名为《中国近代史十讲》，1947年出版的名为《中国现代史读本》，以上这几本书的开端，大体上都是从鸦片战争写起。可见，他们并不认为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有什么本质的差别。

1949年10月以后，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中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概念的认识，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同看法。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胡绳先生发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引起了近代史学者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1957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汇集了三年来学者讨论文章予以出版。这次讨论，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唯物史观，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问题，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次讨论的主题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所谓中国近代史，非常明确地局限在1840~1919年之间，无形之中，这次讨论把中国近代史的时限范围，限制为1840~1919年间的历史。从这时开始，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明确分界，分界线就是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此后，学术界往往把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而把1919年上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出版物，包括学术著作和教科书以及通俗读物，大多数也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下限；有关中国

^① 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编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编辑说明，新华书店，1949。

现代史的出版物，绝大多数以1919年为上限，有的则起于辛亥革命（台湾地区有关中国现代史的出版物，大多以辛亥革命为上限）。换一句话说，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而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在这样的认识氛围下，范文澜在1955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九版说明”中特别指出：“《中国近代史》上册，是1945年我在延安时写的，当时原想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历史一气写下来，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划归上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划归下编，本书则是上编的第一分册。现在因为近代史与现代史已有明确的分期，故将此书改称为《中国近代史》上册。”^①这一次改动，对以后中国近代史书的编纂影响甚大，中国近代史的时限概念几乎就定在1840~1919年。可以这样说，1999年前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书，其时限都是如此。

尽管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主流认识如此，但实际上，许多研究者并不赞成。如中国人民大学教员林敦奎1956年6月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上提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延长至1949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荣孟源在1956年第8期《科学通报》发表《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文章，主张中国近代史断限在1949年9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在1956年7月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国近代史讲座所做的报告，也主张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在1949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1959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②一文中以及1964年在向外国历史学者介绍新中国的历史科学时，也持这种观点。

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历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人们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自1977年恢复研究工作起，即明确1840~1949年间的中国近代史都是它的研究对象，该所的出版物和主办的刊物都以此为准。附带介绍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即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就是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华大历史研究室的主任是范文澜，副主任是刘大年。范文澜、刘大年也是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长、副所长。这就是说，从华大历史研究室，到中国科学院近

^①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九版说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② 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59年第10期，转引自《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第247页。

代史研究所，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其主要负责人都主张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在1949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近代中国的认识不断加深，越来越多学者认为以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对历史认识和学科建设都没有好处，主张将1840~1949年的历史打通来研究。胡绳早在1981年所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中就说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30周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①此后，把近代中国110年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的主张就更多了，“所谓完整的历史时期，就是说这个110年不同于秦汉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而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社会形态，即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②。1997年胡绳在祝贺《近代史研究》创刊100期时，重提“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称之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再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史’”。我本人在1998年先后在《光明日报》和《近代史研究》发表文章，继续阐释胡绳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意见并且讨论与中国近代史分期有关的问题。^③经过这一次讨论，大体上统一了中国近代史学界的认识。1999年，我主编的第一部以1840~1949年为断限的《中国近代史》在群众出版社出版，这是为中国的警察写的一本简明的中国近代史。2007年初，我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十卷本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部写出了1840~1949年间中国近代历史的大部头的通史性著作。

关于中国近代史内部的分期，我在1998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见解，后来又做了修订如下：

(1) 1840~1864年，是中国初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的积极力量对中国社会面临的急速变化作出初步反映的时期；

(2) 1865~1895年，这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尝试与失败时期，也是中国半

①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第1页。

② 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③ 参见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1998年2月3日《光明日报》；《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光明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曾译载于韩国中国学研究中心《中国学志》1998年第4期。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成型期，和中国朝野酝酿变法和改良的时期；

(3) 1896 ~ 1901 年，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的发生和失败，八国联军的侵华导致《辛丑条约》的签订，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确立期，也是中国社会中的积极力量对所处环境作出强烈反映的时期，说明了社会各阶级对国家命运的回答的深度和强度；

(4) 1901 ~ 1912 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下沉沦到谷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帝国主义放弃了瓜分中国的政策，清政府企图自救而失败，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在成长，其政治代表人物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谋求中国的新出路而失败，袁世凯取得政权，并在体制上部分回到清朝统治的局面；

(5) 1912 ~ 1923 年，包括北洋军阀统治和军阀割据战争的大部分时期，是中国社会从“沉沦”到“谷底”并转趋上升的时期。中国社会内部发展开始呈现上升趋势，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迅速成长，并终于取代旧势力开始成为主导社会发展力量的时期；

(6) 1924 ~ 1927 年，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到国民党“分共”、大革命的失败前，是国内两个政权对立的时期，国共合作发动国民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国民革命的高潮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北洋各派系的争权夺利以及军阀政府的垮台，明显地标志了中国社会的上升趋势；

(7) 1927 ~ 1937 年，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建立和中共苏维埃政权的出现，是中国再次呈现两个政权对立的标志。日本实施大陆政策，施展局部侵略中国的政策，打破了中国实施现代化进程的努力，也改变了“兄弟阋于墙”的局面，十年内战时期的政争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西安事变是一个关键因素。

(8) 1937 ~ 1945 年，日本全面侵华，中国人民发动全面抗日战争，并终于取得近代中国第一次反抗外敌侵略胜利的时期；

(9) 1945 ~ 1949 年，是中国两大政治势力为决定中国发展方向而决战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人受侵略、受欺侮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同时也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结束，中国现代史的开端。

《中国近代通史》就是根据这样的见解进行编纂的。

这就是说，1840 ~ 1949 年的中国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1949 年以后的中国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这种看法，在中国近代史学界，现在大体上已经取得统一。

二 “沉沦”与上升：近代中国的 U字形历史进程

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观察，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明显地出现了“沉沦”和“上升”的发展阶段，所谓“沉沦”和“上升”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律。

长期以来，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总的概括是：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屈辱的历史。从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失败时候起，中国社会便逐渐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这便是近代中国历史的“沉沦”，不是时代的进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是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是不可分割的。半封建是在半殖民地前提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是晚清封建社会腐朽落后丧失部分独立主权而形成的，这种半封建不等于半资本主义。近代中国的苦难，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沉沦”是基本的特征。这是历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史的一种总的解说。

二十多年前，有学者发表论文，提出近代中国不仅有“沉沦”，还有“上升”，认为近代中国社会“从发展趋势看，存在着两个互相矛盾而又互相连接、互相制约的过程，一个是从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过程，一个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存在着某种关联，但本质上不是互相结合，而是互相排斥。前者是个向下沉沦的过程，后者则是个向上发展的过程”^①。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是对独立国家而言的，半封建是对半资本主义而言的。半殖民地地位的确立并不等于半封建社会的形成，二者并非同一取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并非不能分割。向半殖民地的沉沦主要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向半封建的发展主要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社会是社会的进步，而不是“历史的沉沦”^②。半资本主义的存在，就是“上升”。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有“沉沦”，而且有“上升”。这种“沉沦”和“上升”是同时并存

^① 李时岳：《近代史新论》，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第21页。原文题为《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发表于《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收入文集时做了修改。

^② 参见李时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

的。这是历史学家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又一种解说。

说近代中国“沉沦”，是有道理的，因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社会发展的落后和政府的腐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中国社会不能正常发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权沦丧、战争频仍、人民受苦，这还不是“沉沦”吗？但是，仅止于此，却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近代中国以后有积极的、向上的发展。说近代中国的“沉沦”中有“上升”，也有它合理的地方，因为在沉沦、屈辱的中国，仍然存在着上升的因素。但说在“沉沦”的过程中始终“包含着向上的因素”，“沉沦”与“上升”同时并存，也不能解释整个中国近代史。

怎样解释才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呢？

帝国主义侵略确实使中国社会发生“沉沦”，使独立的中国社会变为半殖民地，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受到严重损伤。但是，由于中国人民在“沉沦”和屈辱中不断反省和觉悟，反抗力度逐渐加大；也由于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下逐渐生长了资本主义特别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产生了新的阶级力量，因此，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增加了“上升”的成分，“沉沦”不是中国社会的唯一标志，换句话说，近代中国社会也不是永远沉沦下去。即使是“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这个“深渊”也应该有一个底。这个底就是“沉沦”和“上升”的转折点。

这个深渊的“底”在哪里？底就在20世纪的头20年，就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后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因为是“谷底”，所以是中国社会最困难的时候：《辛丑条约》给中国带来了最大的打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更加重了，西有英国对西藏的大规模武装侵略，东有日俄在东北为瓜分中国势力范围进行的武装厮杀，北有俄国支持下外蒙古的独立运动，南有日本、英国、法国在台湾、九龙租界地和广州湾租界地的统治；到1915年以后，又有日本强行向中国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21条，辛亥革命以后又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日本出兵青岛和山东以及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至于极点。看起来中国社会变得极为黑暗、极为混乱，毫无秩序、毫无前途。这正是“沉沦”到谷底的一些表征。但是，正像黑暗过了是光明一样，中国历史发展在谷底时期出现了向上的转机。19世纪60~70年代从西方引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慢慢在中国社会落地生根，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始有了较大生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成长起来，并逐渐发出经济和政治的呼声。与此同时，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也开始成长和集结。中国社会内部增长着的资产阶级改革派开始组织

起来，向清政府要求政治权利，发动了一系列对内对外的政治、经济诉求。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壮大起来，并导演了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的伟大历史事件。这个革命的结果，资产阶级革命派未能掌握国家政权，社会政治、经济未能按照革命派的设计沿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向发展，甚至更加黑暗，中国人重新考虑出路。于是，新文化运动发生了，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了，马克思主义大规模传入并被人们接受也在这时候发生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从这时候改弦更张，重新奋斗。中国共产党在这时候成立并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明确主张。我们可以看出，从这时候起，中国社会内部发展明显呈现上升趋势，中国人民民族觉醒和阶级觉醒的步伐明显加快了。在这以前，中国社会也有不自觉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有改革派的主张和呐喊，但相对于社会的主要发展趋势而言，不占优势；在这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有加重的趋势（如日本侵华），但人民的觉醒，革命力量的奋斗，已经可以扭转“沉沦”，中国社会的积极向上一面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了。

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像一个元宝形，开始是下降，降到谷底，然后上升，升出一片光明。这就是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直到20世纪初期，包括《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到北洋军阀统治的大部分时期，中国社会的“沉沦”到了谷底。在谷底及其以前的时期，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面临的主要是“沉沦”，虽然，中国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实际上存在着积极的、向上的因素，但这种因素的发展是渐进的、缓慢的，相对于社会“沉沦”主流来说，它是弱小的；北伐完成，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开始走出谷底，随着新的经济因素不断成长、壮大，随着新的社会阶级的出现，随着人民群众、社会精英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日渐觉醒，社会向上的、积极的因素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流因素，影响着社会向好的方面发展，虽然，消极的、“沉沦”的因素仍然严重地存在，其对中国社会的压迫，甚至不比北洋军阀时期以前弱。但是由于有新的阶级、新的政党、新的经济力量、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这样的上升因素在起作用，终于制止了帝国主义使中国滑向殖民地的企图。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近代史不仅是屈辱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不屈不挠奋斗的历史。所谓屈辱主要体现在历史的“沉沦”时期，所谓奋斗，主要体现在历史的“上升”时期。这不是说历史的“沉沦”时期没有奋斗，那个时期中国人民有过不少次的奋斗，但是，由于觉醒程度不够，物质力量不够，斗争经验不够，那时候中国人民的奋斗还不足以制止

中国社会的“沉沦”；在历史的上升时期，不是没有屈辱，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甚至比以往历次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还要严重，但由于中国人民空前的民族觉醒和空前的艰苦奋斗，中国社会不仅避免了继续“沉沦”，而且贏来了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从而避免了给中国社会带来新的屈辱，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为中国的现代化造就了基础条件。

“沉沦”和“上升”，中国社会走出了一条U字形路线，经过了110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诞生了人民的新中国。

三 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若干转折

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路径或者方向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历史可能循着某种路径发展，历史条件改变了，发展的路径也可能改变，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转折。近代中国历史在多数情况下，是暴风骤雨似的，是急剧变化着的，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多次历史转折。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对于我们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曲折性、艰巨性，历史发展道路的可选择性以及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是有帮助的。观察中国近代史，应该注意这种转折，应该研究这种转折。

我们已经研究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U字形进程，发现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前期，其基本特征是“沉沦”，近代中国历史的后期，其基本特征是“上升”，在“沉沦”和“上升”中间有一个过渡期，就是“沉沦”的谷底时期，也就是“上升”的起始时期。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转折。我们可以运用这种理论，来观察近代中国历史，还可以发现各个不同的历史转折。正是这些不同的历史发展转折，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从“沉沦”到“上升”的基本过程和特点。

从鸦片战争开始的晚清时期，基本上是近代中国的“沉沦”期。众所周知，1840年抵抗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鸦片战争的结果，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炮舰迫使中国接受了东方世界并不熟悉的带有西方殖民色彩的条约体系。清王朝时期的中国，开始从独立发展的封建的中国，逐渐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从此以后，清王朝在对外战争中，在对待强大的资本主义入侵者的过程中，捉襟见肘，步步退让，逐步加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印记。由不平等条约为基础所构成的条约体系，是中国历史从来所未见